

导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也自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题。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希望弄清楚，它们在增长的引擎和增长的格局上出了什么毛病，从而寻求一种适合其国情的发展模式。

中国近代，特别是 20 世纪前半期的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的基础和起点。因此，对其发展状况、达到的水平、性质、特点，以及发达与否原因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对于总结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经济成长的得失和当前经济改革方案的选择是否合乎国情，不仅可以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借鉴，而且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和本书的结构体系

长期以来，对旧中国经济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这一学科领域中，由于受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影响，只把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生产力的研究，又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述的片面理解，也忽视了对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研究。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被囿于几种所有制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狭隘空间。各种经济史教材中大多按照所有制关系将中国近代经济分割为几大块，即：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农村的封建地主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等。这就割裂了经济统一体内部事物之间的联系，片面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过分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矛

盾，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同一性。以至对百余年间中国经济总的发展状况没有总体的分析。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周期性波动、各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的作用、国民经济各部门结构的变化、国民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消费和积累的一般趋势等一系列在近来世界各国经济史著作中都被当作主要内容的重大课题却很少有人、甚至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未能摆脱通史、革命史结构的模式，在时期和章节的划分上以政治事件的发生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转移，无视其特定研究对象自身的发展状况和规律，往往陷于削足适履的难堪境地。这就不能不使从事现实经济研究而希望了解历史的学者，乃至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经济史读者感到失望。因此，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克服旧体系的缺陷，是中国经济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80年代以来，对旧中国经济研究的上述缺陷逐步为多数经济史学工作者程度不同地有所察觉，反对将生产力作为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学者也已为数不多。经济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作系统的宏观的统计分析，我们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①，本书的写作即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与过去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科书不同，本书以旧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周期、国民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需求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说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经济机制和运行的内在特征，及其发展与否的原因。在叙述的方法上，采用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个别，再由微观到宏观、个别到一般的序列结构，在竭尽一切可以找到资料基础上，力图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作全面的考察。

^① 该项目的最终成果《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已于199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需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句名言十分形象和深刻地阐明了运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比喻可以认为，毛泽东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工具，看作一种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科学手段。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以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研究的典型，其对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经济研究的指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资本论》某些章节本身就是直接阐述英国的经济发展史，仅就其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中的原型和作为比较研究参照系的价值而言也是不可忽视的。认真钻研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是我们今后长期努力的方向和任务，不可盲目接受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致对马克思的学说只有肤浅甚至错误的理解。

就历史学的范围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西方很多史学流派都受到他的影响，在对历史问题的观察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其他西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善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了”，^①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则称：“马克思是当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② 在本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和历史学家那里，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思维的工具，那么很多中国经济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某些论述和原理作

① 《奇怪的绩效》，《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引自陈后能：《苏联学者对年鉴学派看法的变化》，《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4 期。

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唯物论原则的同时，不断引进世界各国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经济史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打开眼界，开辟研究的新领域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高经济史的研究水平，使认识不断深入，赋予这一学科以活力和生气。忽视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或在理论上固守前人的论断，不关注其发展和创新，则无异于作茧自缚，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逐步与传统史学划清界线。新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即在于他注重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作跨学科的研究，对历史问题作出理论的诠释。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皮埃·肖努(P·Chaunu)认为，经济史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方才开始，在此之前所作的研究只有文献的价值，他称之为考古式的经济史。^①只是到了这一时期，由于人类在认识论上的飞跃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才使经济史成为一种理性的科学，把复杂的社会经济历史现象作为一个体系来探讨，从而产生了现代的经济史学，从 30 年代开始，价格理论、周期理论、国民收入统计和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等被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到 20 世纪中期，新经济史学成为向传统史学家挑战最有力的领域。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在概括新经济史学与传统经济史学的区别时认为：新经济史学的特征在于“它要求用系统的理论作为一般原则的来源，并要求同样系统地运

^① 《经济史 成就与展望》，载勒戈夫和诺拉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74 页

用数量方法来组织数据资料”。^①

经济学理论的长足进展，使它走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前面，从而为经济史研究运用这套理论提供了条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史研究有大量使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倾向的同时，经济学研究也有广泛运用历史分析的倾向。总的说来，这两个科学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转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从而导致了历史学与经济学更加接近和结合。因为要研究增长、周期、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的分配等领域的趋势，就不能只观察短期现时的经济现象，而必须把目光投向历史，促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作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因为经济计量学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从观察已经发生过的经济过程得来的，所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而从历史研究的领域看则是一种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家正是通过研究历史上发达的经济现象中各种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归纳出一定的模式和变化的趋势。

近年来国外已经出版了一些向历史学界介绍经济学理论的著作^②，但其介绍的原理都比较浅显，作为入门虽然还有其价值，但对深入研究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根据特定的研究方向的需要，在经济学的某些学科，乃至社会科学中的某一种理论方面作较深入的钻研。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中外经济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西方经济史学家批评我国的经济史学者只有历史编纂学的知识，而缺乏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

①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 6 卷，1968 年版，第 46 页。

② 如哈威克著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经济学》（G. R. Hawke, *Economics for Histori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费雷德著的《向历史学家介绍计量的方法》（Roderick Floud, *An Introduction to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Histor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专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① 对于这种批评,我们初始觉得似乎是张冠李戴。因为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历来是非常强调“以论带史”的,文献学和考据学的方法是包括资产阶级史学在内的传统历史学的特征,这顶帽子是戴不到我们头上的。进而考虑这种批评自有其来历,无非指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颇有进展,而其中的很多学科,如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在我国则几乎空白了 30 年,理论的贫困和方法的陈旧是造成我国历史研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些年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不少,我们赞成一些人的意见,即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也可以对同一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中国史学界早就有“史无定法”的主张。因此,未可寻求一种万能的方法代替其他,片面的抑此扬彼,用简单的“是”与“非”加以评判。这将有助于史学的繁荣,也易于为大家所接受。一般说来,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产生,将有助于对历史现象认识的深化。我们要掌握人类复杂的经济史发展历史,必须不断更新我们的理论和方法,但其运用的范围和层次总是有限度的,任何一种新的方法也不能希图用来解决全部历史问题。因此,传统方法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史学界,也还有很多学者在继续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工作。当然,在我们惯用和尚不熟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应侧重提倡引进和运用后者。譬如发展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等等。目前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前两种方法在西方已经度过他们的黄金时期而趋向衰落(这些学派自己并不这样认为),而后两种方法已经或者正在形成潮流。因此,一

^①费维凯编:《从宋代至 190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1980 年美国代表团参加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报告》(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 Report of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to Sino-American Symposium, Beijing, 26 October-1 November 1980. Ann Arbor,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种“迎头赶上”和“超越”的主张，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学者的头脑中萌生。这种意见，我们认为不妥。如前所述，一种新的方法往往是应解决某一层次或某一范畴问题的需要而生，我们不去掌握它，将使我国历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领域继续空白下去。以计量历史学派为例，其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显著的成绩，在对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以及加勒比、中东、印度、泰国等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研究中颇有建树。前苏联和波兰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也取得相当的进展。许多国家计量经济史学者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同样的材料，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采用计量的方法加以分析后，就会比以前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一大步。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计量研究可以说刚刚开始，它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不同的课题，发掘整理必要的数
据，或对已有的数据加以重组和推算，在具备了基本构件以后，建立起各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型，进而分析各种因素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新一代历史学家勒普瓦·拉迪认为无可计量的历史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历史。近年来我国的一些经济史学工作者在论及研究方法时都一再强调计量分析的重要性。吴承明先生指出：“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就可以破许多假说，立论才有根据。”^① 我们以为，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如果不能用明确的数字序列来加以表示和衡量，而只能用一些、较多、很多、几乎等不确切的概念来描述，那只能说明我们对它的了解是肤浅的，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科学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量和质是对立的统一，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量的界限。一定的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量变达到一定的限度，事物的质就会改变。量和质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经济发展史上各个阶段的划分，既有其质的规定性，也有其量的规定性，即生产力发展速度、水平等

^① 《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的规定性。对这些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不作数量分析，就轻率地得出带有质的规定性的结论，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的。我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要力求改变过去那种举几条文字材料就得出一个结论的研究方法。早在 40 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要求我们做到胸中有“数”。他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的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①。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尽快摆脱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的这种错误倾向。

传统史学在方法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就在于完全依靠文献资料中对个别事物的记述或零星的数字，以举例说明的方式，然后加以概括，作出以偏概全，或模糊不清的定性推断，在如何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分散到综合，由微观到宏观的方法论上陷于困境。其结果往往是在没有弄清楚某一历史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或在作出一种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却把主要精力放在解释其原因方面。即使是在结论正确时，这种原因的分析也往往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无法深入其本质，更不可能准确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率先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派，即计量经济史学派，恰在解决上述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范围的方法方面，克服了传统史学的缺陷。它按照经济学理论和范畴的需要，从经济分析的概念出发，发掘和整理资料，运用数理经济的方法对已经占有的原始数据加以重组和归纳，某些文献中没有直接计量而又必不可少的数据，则从已知的变量中，根据经济学原理中已判明的函数关系加以推算，使之可以从宏观上和总体上来描述和认识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42 页。

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如果数据齐备，还可以按照模式，用反事实度量的多元回归，对影响某一事物的各种内在因素作定量的分析，从而可以区别这些自变量对某一因变量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开辟了许多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学术领域，并可以检验以往历史研究中那些未经计量的定性判断，使那些符合或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得到验证，将那些错误的结论加以纠正，并提出科学的新见解。

在计量经济史学家看来，按照研究的要求，对一些历史文献中没有（或根本不可能有）的序列数据，根据已有的数据间接加以估算或推算，不只是对历史认识深化的需要，而且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这正是他们的优势之所在。比如美国新经济史学对 19 世纪美国国民收入、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铁路的运输效率等的估算被认为是他们最有成绩的贡献^①。

新经济史学派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研究美国经济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为我们所熟知，无论其观点引起多少批评，但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他们的工作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充分证明了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著名史学家费希洛称之为“采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改写美国经济史”。也可以说在新经济史学家这里，恢复了斯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紧密结合的传统，或用福格尔一篇文章题目的说法，是实现了“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再统一”^②。

在日本，以已故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大川一司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经济

^① Lance E. Davis and Stanley Engerman, *Cliometrics: The State of the Science (or Is It Art or, Perhaps, Witchcraft?)* Edi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llinois. *Historical Methods*, Volume 20, Number 3, Summer 1987, PP. 97~106, Chicago. 兰斯·戴维斯和斯坦利·恩格尔曼：《计量历史学：科学的说明（或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魔术）》，《历史学方法》第 20 卷，第 3 号，1987 年夏，芝加哥。

^② 《美国经济评论》，1965 年第 2 期。

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零散和缺乏，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方法，在这方面经过实验做出成绩，理应成为我国经济史学工作者的奋斗目标，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望而却步的状况必须改变。至于少数人视新方法为异端，在对其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浑然不解的情况下，即盲目加以排斥的态度，更是不足取的。

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较之经济学的其他方面有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旧中国的发展缓慢固然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但应当看到不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而不只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全球的环境中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作比较的研究。事实上，直到今日，经济落后的原因，不只是在中国得不到完整的解释，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正在研究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为什么会先发展起来，在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者看来，似乎是较之不发达更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因此关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就方法论而言，发展经济学大多运用比较的方法，在对世界做国别和区域性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其发展过程的异同，推导出各种增长的模式（不过这些著作中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或是空白，或失之于肤浅）。因此将其得出的结论，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并检验其适用性和局限性，也是本书的一项任务。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日本是欧美以外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与中国在历史背景、近代化起步的时间和起始条件、发展过程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本书在各有关章节中，较多地注意

了以日本近代经济发展作为参照系，^① 以其作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获得迅速经济增长的范例，与中国相同阶段进行比较，这样有助于认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得失所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的经济史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几年来，诺思的理论也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托马斯合著）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相继被译成中文。最近，他另外两本关于制度变迁的著作也已用中文出版。这显然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客观需要有关。

从事美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诺思本是计量经济史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研究美国经济增长问题上颇有成绩。代表作有《1790—1860 年美国经济增长》（1961 年）、《美国经济史的数量分析》（1963 年），可惜这些著作和论文至今没有见到中译本。后来诺思的研究转入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西欧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1971 年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还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发表了《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两篇论文，提出了制度因素，亦有效的经济组织对经济进步起决定作用的概念，认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等，亦生产力的进步，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由上所述不难看出，诺思新经济史理论的提出是在弄清美国经济增长的实绩以后。我们在引进或运用一种国外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时，必须注意到我们与他们所处的不同条件。否则，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在没有搞清楚我

^① 作为比较的坐标系的选择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本书除以中国与日本的相同发展阶段作横向的比较以外，也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相应阶段进行比较。因为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看来，日本的发展是一个例外，因此不宜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普遍尺度。

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真实状况，特别是没有起码的统计分析之前，即作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判断，然后匆忙转入原因的分析，这正是我国传统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应当看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因素分析的很多基本前提尚不具备。因此，在运用这种新的经济史理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补上这一课。试想，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心中无数，还谈得到作因素的分析吗？如果我们对其发展状况作出违背历史实际的结论，那么所作的因素分析还有什么价值呢？

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必须摆脱就经济论经济的纯经济倾向，政治因素，乃至文化因素的研究，迟早要被引入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考虑到这种意见的合理性，适当加强了这方面的论述，并试图将诺思新经济史理论中某些可操作部分，如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等，用来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

近十多年来，西方史学虽有一种向叙述史学复归的趋向，但其在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并无变化，而且这种所谓新的新史学主要不是出现在经济史领域，而是出现在其他史学领域。我们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发掘和整理资料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还是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用。因为无论是资料的选择和编辑，还是数据的归纳和重组都是要在某种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西方经济史学的发展说明，其创新的过程是新的经济学理论或某种其他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不断被引进并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取得新的成果，使我们的认识得以深化的过程。^① 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新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不熟悉和难于活用。一些经济史学工作者由于只是把某种理论作为一种外加的套语和标签，用以装饰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实际在方

^① 《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法上仍然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归纳，以及线性的因果分析。那么，应如何在经济史研究中正确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呢？我们将在下节加以讨论。

三、经济史研究中应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它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历史资料来印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以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是根据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来演绎出历史。经济史的写作实际被经学（这里的经是指儒家经典）化了。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主导倾向就是附属于经学的，撰写史书的目的是为儒家经典作注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写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客观、正确、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更不可能在理论上有所创造。这种研究历史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向认为，他们的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和方法，而不应把它作为现成的模式，如果拿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历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者主观的选择。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说：“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①，而选择是以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从漫无边际的史料中，不加任何主观判断，就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收集资料要有提纲，要进行分类；开始研究工作后，要确定分析的框架和途径；为解决问题运用何种中介手段和如何运用；采取哪些概念和范畴来进行表述等等，都有某种理论在起指导作用。但这里必须辨明的是这种被选用的理论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方法和手段。一般说来，经济史学家在着手一个研究课题时，用作分析工

^① 《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译本），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 页。

具的理论构架都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利用经济学研究的既有成果，不管研究者本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不断引进和运用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首要的作用是扩大了选题的范围，使研究的课题变得多样化。这些理论提供了在传统史学家所不曾注意或无法研究的领域进行思考、解析、论证的新方法，从而按照这种观察问题的框架和它们所阐明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把过去历史学家看来没有价值的史料，或新发掘出来的史料，经过排列、归纳、分析，能说明很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这种依据理论模式对史料加以重新的组合，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令人惊异的力量。一种新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被成功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即在于它能提供一种与以前不同的、可以操作分析的关于一组重要的经济或社会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系，从而能够说明当一个或数个变量变动时对整体的影响。

所以，我们所提倡的运用经济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的正确方法，不是过去的标签式的引用经典作家语录的办法；也不是新名词、新概念一大堆，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历史，甚至有时作者自己也搞不清他们所使用的名词和概念是什么含意。我们一定要避免不尊重历史事实，或对史料予以牵强附会的解释，亦以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来剪裁历史，用一种新的教条符号代替旧的教条符号体系的倾向。经济史学是否遭受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侵略而丧失其独立性，并被同化，取决于研究者是生搬硬套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还是将其作为一种观察的手段而加以活用。用史料来附会和印证某种理论框架的做法，不只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是时刻应当注意避免的一种危险倾向，在西方新经济史学派的研究中应当说也不乏前车之鉴。吴承明先生在他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中引用了索洛对这种状况的批评，并指出经济史

“应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①。

当我们运用某种理论来研究历史时，如果发现不能解释的现象，不应用理论框架来剪裁历史，而应考虑这种理论有什么不完善之处，从而加以修正。在遇到这种矛盾时，正是我们在理论上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临界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只有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修改某种理论前提假定；二是发现其在逻辑演绎过程中的失误。而这两种情况往往都是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得到启示的。前者如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制度不变或可以忽略的前提的修正；后者如福格尔对传统史学界关于美国东西部间铁路修建与经济增长之间逻辑联系的批判。诺思在研究 1600—1850 年期间的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其效益的增长，所以提出他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理论在他以后对西欧经济史的进一步研究中不断完善，创造了包括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在内的一套分析框架，从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里的关键问题，一是在面对理论与历史的矛盾时，不陷于旧模式的窠臼，要有勇气敢于成为新思想的启迪者；二是要有构建理论体系的思维能力。

纵观西方经济学说史和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都是在理论，尤其是在分析方法上有创造者。我国学者的困难和差距似乎在于长期受到是非标准的权威观和传统观的束缚，缺乏理性化的独立思考精神，在面临需要创造自己特殊的分析概念和体系时，经济史学家尤其显得无能为力。

近些年来，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有“冲击——反应”、“高度平衡陷阱”、“不发展的发展”、“过密型经济增长”、“过度市场竞争”、“中国中心”等理论的提出，但这些理论并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分析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史学工作者虽然成果累累，新观点也屡有所见，但在构筑新的理论框架的道路上，似乎还有一

^① 《经济研究》1995 年 4 期。

段路要走，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有一个台阶要上。

我们引进用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以西方近世经济社会矛盾为出发点所提出的，它们对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中国，由于经济形态有共同之处，因而作为一种分析的手段，其各种概念、范畴和原理都可以拿来应用。但中国近代社会中除了这种与西方相同或类似的因素外，还有大量由传统社会中继承的因素，这些因素则是与西方的中世纪不同质的，因而往往是引入的经济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比如中央集权国家直接参予生产经营活动和对流通领域的垄断，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家庭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经济组织，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经济生活的规范作用等即属于此类。我们应设计出新的概念、新的变量和新的结构模式来说明这个与西方不完全相同的经济形态。所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由其研究对象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答案不在既有的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中，也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各种文献之中，它有待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者的创造。

任何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有各种前提假定，这些前提条件有些是被公开说明的，有些是暗含的或不言而喻的，而这些假定和前提对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都未必成立。比如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就不适用于生产是为了自己消费和儒家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中国农民的经济活动。再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概念、原理都是以完全的市场经济作为前提条件的，在用于中国近代这样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大部分农产品和一部分手工业产品不进入市场的经济形态时，应如何加以修正？只要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着力探索，我们就可能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作出贡献。

四、几点说明

本书的基本内容分作四个部分进行叙述。第一部分讨论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第二部分叙述国民经济各部门和行业的发展状况，第三部分讨论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第四部分讨论国民收入分配和需求变动。为了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在全书的开头设置了序编——近代化以前的中国社会经济。

由于各章节由不同人执笔撰写，所以观点不尽相同是难免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在必须保持观点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对某些个人曾经发表过的观点作了修改，譬如增长和周期两部分的写作，如果作者的意见不能统一，则无法纳入一书。另一种情况是保留各自的看法，求大同存小异。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在不同章节中，有时论及同一问题，但由于作者的观点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所用资料的来源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比如对外国资本作用的评价、中国和外国资本企业利润率高低等问题即属此类。这种处理方法，我们认为也是合理的。例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即如此，而且在结构上，可以说较本书更松散。当然除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第三种情况，即属各位作者对自己以前的观点或计算的数据加以修正，尤其是后者自应以本书的数字为准，这种情况甚多，不再一一举例说明。

本书的写作理应在一部更为完善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编纂完成以后，但由于教学的需要，不能长期等待下去，因此只能就现有的资料勾画一个轮廓。前述计量经济史学某些方法的运用，譬如对作用于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作多元的回归相关分析，可谓是难为无米之炊之事。就是经济发展一般趋势的估算，错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待于不断的